

粮店

□ 邓文梁

记忆中的唐洞粮店是一栋两层楼的红砖房，粮库在楼上，门市在楼下，前庭有一个很大的院子，院子前的马路上人来车往，一派繁忙。

我还记得，人和车打粮店前经过，总能看见高大的屋脊上落满叽叽喳喳的麻雀，伶俐细脚在人们的视线里移来挪去，像在寻找攫取粮食的最佳时机。白天正常营业时，粮店大门口常常排着很长的队伍，人们肩上挑着箩筐（筐里放着油瓶），手里拿着粮油册，眼睛望着前方，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脚步。

在全国粮食紧张的计划经济时期，这里的粮食供给让人羡慕，源源不断调运而来的粮油在矿山的天空下散发出诱人的馨香。因此，粮店周围的麻雀都异常活跃。

作为细仔子的我，蹦蹦跳跳跟着父亲来到粮店，头脑里的念头与父亲的心思大相径庭。我不会去关心大柜台上的粮油册排到了什么位置，更不会去了解自家粮油册上还有多少粮油，N次购买后家里还余下多少大米和茶油，或者红薯和苞谷。我虽然也知道那

个时候的粮油十分珍贵，对于在矿山从事井下劳动的矿工来说，就是力量的源泉，就是煤海黑浪翻滚的加速器，但我的兴趣重点不在这里，而在于粮店设计设施给我带来的视觉冲击。我喜欢趁父亲不备，突然纵身一跳，整个身子就跌进了那个接米的水泥大坑，用手抚摸那光洁的水泥平面，然后抓牢被米粒冲刷得异常光亮的木制漏斗，将头探到斗口，想要看清漏斗里面的世界是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，想要听到米粒从米仓奔袭到漏斗隔层的沙沙声。随着工作人员一脚踏响放米板，我便能感受到那白亮的米粒带着瀑布般的飞流之势，将箩筐滋滋盛满。每当此时，喜悦的心情就会写满脸庞，手忙脚乱地将撒到地上的米粒一粒不剩地捧入箩筐，再用双手抓紧筐底，使劲摇晃，让虚高的米堆一点点沉落下去，以便掏出箩筐和起肩行走时，米粒不再撒出。

看着大米飞入箩筐，父亲是欣喜和慌乱的，生怕跑掉一粒粮食。他不是井下工人，粮食的定量不高，加上已将晚秧从农村接到

矿山上，一家七口人吃饭，粮食不够就要到黑市上去买。从那时起，一个特定环境下产生的特有名词就深深烙印了我的记忆——黑市粮。尤其是这个词从母亲的嘴里忧郁地吐出来，硬生生撞进我的心房，便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。这个时候，我通常不会去看姨的脸，因为无论看与不看，我都知道，她脸上的肌肉在抽搐，这种表情之下的内心波澜，我当时是无法理解与描述的。

父亲在泥坑里蹲身起箩时，我帮着父亲把箩筐从坑里吭哧吭哧地抬上来，然后拍着巴掌来到高高的柜台前。柜台上有一个神奇的U形管子，工作人员按量压下阀门，管子里便会流出色泽醇厚、清香扑鼻的茶油。我家装茶油的玻璃瓶子常年深褐，光滑油腻，我用双手捧着，常有捧着古董之感，生怕不慎跌落这个年深日久的瓶子，遭到父亲的责骂。好在我从来没有失过手。我不仅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扭开瓶盖，而且还能准确无误地将瓶口对准出口。看着从管子里流出来的茶油一圈又一圈将瓶子灌满，我的脸上十分陶醉，我的鼻翼不

断扇动——好香哇！我希望手中的瓶子不断变大，油管里的茶油永流不止。我把这个想法大声告诉父亲，父亲笑着刮了一下我的鼻子，引来周围人群的放声欢笑。

这样的过程中，父亲每次都能预知茶油在灌到瓶颈时，会有些许溢出。当他的食指和大拇指及时合围时，浓稠的油汁已沾满了他的手，我听见他嘴里不断发出“哦哦”之声，接着将手指上的油一点点刮到瓶盖里，脸上露出别样的欣喜。

也许是唐洞这片热土的护佑，也许是粮店这方空间的包容，这里的麻雀都不怕人，只要人们不去捉、不去赶，它们便会大大咧咧地与人抢米，贼亮的目光、灵敏的行动、搞笑的动作，把人们看得直拍大腿！

长大成人后，回忆起国有粮店给矿山生活带来的快乐与温暖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在那个年代是集中统一管理粮店，为全体矿工思想和肌肉注入了力量，推动了人的能量与煤的能量的聚集与爆发。现在我依然会悄然想起在几乎找不到踪影的国有粮店。

支教岁月

□ 全寒梅

弹指间，二十四年了。可那段记忆，仍如昨日般清晰。那年去桂阳乡镇支教，一辆老旧的中巴车在崎岖的土路上颠簸，仿佛永无止境。车窗外，黄尘如幕，每一次颠簸都卷起新的尘雾，它们无孔不入地钻进车厢，落在头发上，粘在皮肤上，连呼吸之间，鼻腔里都是那股浓重的、带着泥土腥味的黄。我靠在窗边，看着自己才洗干净的衣服很快蒙上一层灰黄，心里涌起的是前所未有的茫然。我是个在县城长大的孩子，从未长时间离开过家人，此刻才真切地体会到，所谓“乡土中国”，与我所熟悉的那方寸天地，相差何其之远。当年车子喘着粗气终于在莲塘小学门口停下时，我带着满身的尘土与一丝怯意，走进了我将要生活一年的地方——学校门口一间老旧的木板瓦房。这便是我所有故事的起点。

最初的冲击，来自第一堂课。我站在六年级的讲台上，带着初为人师的热情，用我那身为普通话测试员、自觉标准的嗓音，满怀信心地开始了教学。然而，台下回应我的，是一片茫然的寂静。几十双眼睛望着我，里面有好奇，有淳朴，却唯独没有我想象中的理解与共鸣，我仿佛在演一场独角戏。课后，一个胆大的孩子告诉我，原先带他们的老师是位五十多岁的老先生，心极好，但上课下，大多说着他们听惯了的地方话。我那时从书本上学来的关于教育的理想，在第一堂课便遭遇了最现实的寒流。夜里，躺在木板房吱呀作响的床上，听着缝隙里虫儿的聒噪，我感觉自己像个溃败的将军，连沟通的桥梁都未曾架起，便已失去了阵地。孤独与挫败，在那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，交织生长。

不知怎的，孩子们仿佛感知到了我的无措。他们用最质朴的方式，悄悄为我搭建起一座心桥。周日返校的晚上，我的门外总会响起细碎的脚步声，像林间怯怯的小兽的脚步声。开门望去，人影早已笑着跑远，只留下门槛边静静的“礼物”——几个沾着湿泥的红薯，或几个洗得白净的凉薯。那凉薯的清甜，瞬间润透了我的喉咙，我的心也被这点点滴滴的暖意填满了。

而同事们待我如至亲，将我这个异乡人的心，妥帖地安顿下来。他们总在傍晚时分，热情地邀我“吃茶去”，那一声带着浓厚乡音的呼唤，驱散了我所有的生疏与孤单。记得每每推开李老师的房门，那氤氲的茶香便伴着一股暖意扑面而来，瞬间将我包裹。他们知我独在异乡，便变着法子给予我家的温暖：李老师捧上金黄油亮的糍粑，软糯香甜，说是要解我思乡之苦；刘老师塞来自制的香辣萝卜条，脆爽开怀，笑言比萝卜条更爽……我们围坐在小小的炭炉边，茶水在粗陶壶里咕嘟作响，蒸腾的热气模糊了一张张淳朴的笑脸，也模糊了我的双眼。他们与我话着家常，聊着班上的孩子，那份毫无保留的关切，让我这个游子，真真切切有了宾至如归的安稳。岁月流转，廿四载已过，而那香甜爽辣的滋味时时令我的舌尖回味悠长，那温暖的茶香，也常常萦绕在我的心头，仿佛从未散去。

我的教学，渐渐从高高的云端，落回这片厚实的土地上。我放慢了语速，在普通话里笨拙地夹杂刚学的方言词，课堂终于在善意的笑声中活了过来。清晨的操场上，我和孩子们一起做早操，在晨光中舒展身体；夜晚的教室里，我陪着他们上晚自习，就着昏黄的灯光解答疑问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过去，不知不觉间，孩子们的普通话越来越流利，作业本上的字迹越来越工整。更让我欣喜的是，他们开始主动借阅图书角的书籍，课间也常常聚在一起，讨论课文里的故事。我亲眼见证了他们对语文、对阅读的热情如春苗般悄然生长。

教《第一场雪》，是个晴朗的冬日。我告诉孩子们，雪是分很多种的——“沙子雪”细细密密，打在脸上沙沙作响；“棉花雪”大片大朵，轻轻柔柔地从天上飘下来，就像棉花绽开的样子。孩子们睁大眼睛，想象着课文中“纷纷扬扬下了一夜”的雪景。我们共同在文字里勾勒了一场盛大而纯净的雪。上自然课，我翻遍杂物间，找来瓶瓶罐罐做实验，当蜡烛在水中熄灭，水面上升的刹那，满教室“哇”的惊叹声，让我真正明白：教育，是点燃，是用一颗心，去点亮几十颗心。

后来，我负责起全片区教师的普通话培训。夜里，听着那些比我年长的同事们认真又生涩地跟读，一种深沉的责任感油然而生。我，这个曾因语言而受挫的年轻人，此刻正努力成为一座桥，连接着山野与远方。

一年的光阴，如白驹过隙。临走前夜，我抬头望向那片熟悉的夜空，星河依旧璀璨。我忽然懂得了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的真正含义。那火，并非我初来时手握的微弱，而是在与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碰撞、交融的过程中，我们共同擦出的生命火星。它微小，却坚韧，足以照亮彼此前行的路。那光，至今在我心中燃烧，清澈，而明亮。

奶奶爱唱伴嫁歌

□ 萧林生

在制作嘉禾伴嫁歌视频时，悠然婉转的歌声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奶奶，想起了她唱伴嫁歌时的情景，宛如就在昨天，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奶奶出生于1928年，16岁就依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嫁给了比她大一岁的爷爷。我的家乡嘉禾县袁家镇是湘南丘陵山区，难得有几片开阔平坦的田地。奶奶家所在的汪村地处袁溪河畔开阔地带，耕作方便，条件较好。这跟伴嫁歌《半升绿豆》里的主人公遭遇十分相似：“半升绿豆选豆种那，我娘（那个）养女（就）不择家呀”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了（那个）歪捶古（注：古代妇女洗衣时捶衣服用的木棒），背起走呀”。歌里女子的无奈，像极了奶奶年轻时的境遇：既揣着对自由爱情的念想，又不得不向包办婚

姻、柴米油盐低头，满腔的幽怨与期盼，都融进了这缠绵歌声里。

奶奶没进过学堂，却会唱几十首伴嫁歌。有的歌词还特别长，比如：叙事长歌《日头出来晒娘家》，讲述的是书生杨小郎与张满水生死离别的爱情故事，与“梁山伯与祝英台”一样凄美动人，歌词长达100多行，奶奶唱得流利又动情，每个角色的语气都分得清清楚楚。奶奶说，这些都是老一辈人口耳相传的。村里有人嫁女儿，都会请奶奶去坐歌堂、当“歌头”，她往桌边一坐，清嗓子的一瞬间，喧闹的歌堂便会慢慢静下来。

幼时的我常常跟奶奶去歌堂，眼里只有满桌的糖果、花生和麻花，只觉得满屋子笑声、歌声很热闹。直到后来当了记者，去采访、研究伴嫁歌民俗，才真正懂得了这首歌里的深意。伴嫁歌的唱词、曲调，都跟着婚俗流程走：新娘出嫁前两晚的“伴小嫁”，多是短歌，哪怕家境再难，也得唱上一晚图个

吉利；条件好些的人家“伴大嫁”，要连唱三晚，内容分八层——先是伴娘布置歌堂，“歌头”起唱《安席歌》定调，接着是逗趣的《耍歌》、应答的《射歌》；到了“伴大嫁”，还要唱《长歌》讲古，唱完后姐妹们手拉手跳《伴嫁舞》，直到黎明时分花轿临门，新娘红着眼眶唱《哭嫁歌》，字字饱含不舍之情；花轿抬走时，女伴们唱着《送姐》送别；等婚后三日新人回门，姑嫂姐妹又用《徒歌》打趣新郎，这才算把伴嫁的仪式唱圆满。

歌堂上的奶奶，是受人尊敬的“歌头”；可走下歌堂，她要扛的是10多口人的生活重担。奶奶生了9个孩子，其中两个小儿子分别在5岁、16岁时因病夭折；还有一个孤儿侄子也由奶奶接来抚养，全家的吃穿用度都压在她肩上。在我幼时记忆中，奶奶不但针线活做得好，灵巧的双手会缝制各种漂亮衣服和帽子，而且总是想方设法寻找食物，不让我们饿肚子——春天挖野菜做窝窝

头；夏天摘栀子花拌米粉蒸着吃；秋天上山采野果、挖葛根；冬天趁山塘干了，挽着裤脚在刺骨的冷水里捞小鱼小虾，裹上面粉油炸成美味可口的“灯盏糕”。那时候，稻田插秧育秧时鼠患成灾，人们会在秧田里安上电网打老鼠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被电死的老鼠也被剥皮后油炸成美味佳肴。

日子再苦，奶奶都尽力让孩子上学读书。我父亲是老大，高小毕业，在20世纪60年代初算“文化人”，当了生产队会计，后来又去镇办煤矿机电维修班当班长；除了早逝的两个小叔叔，其他叔叔姑姑都读了初小或初中，二叔还考上师范成了老师——这是奶奶一生中引以为豪的事情。

2021年底，94岁高龄的奶奶安详地走了。如今4年过去，每次听到伴嫁歌，我都会想起她，音容笑貌历历在目。特别是她坦然面对生活、笑对艰难困苦的精神，激励着我不断奋勇前行。

缅怀家父

□ 邓圣泉

家父邓天福，于2024年9月17日溘然长逝，享年97岁。身为一名有着72年党龄的普通共产党员，他的一生，平凡之中见伟大。

家父1928年3月出生在北湖区鲁塘镇陂副村贫穷的农户家里，他是在饥饿和劳累中熬大的。

奶奶童年乞讨流落在外（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人），后来被爷爷家收养，成年后嫁给了爷爷。奶奶生下大姑、大伯和家父后，家里负担更重了。体弱多病的爷爷靠给别人做长工养家糊口，后来活活累死在外头。奶奶只好带着幼小的家父改嫁。

家父十岁时还穿着露出屁股的裤子，但他很想上学读书。奶奶怯声哀求爷爷想办法让孩子上学。爷爷觉得这孩子有些聪慧，于是东拼西凑筹齐了一个学期的学费，让他入了村里的三家堆私塾，读了四个月书。他辍学后，虽然每天跟着爷爷干农活，但他想继续上学的欲望仍然很强烈。家庭条件无法满足他的奢望，他只好买回老师编的识字本在家自学。

家父十五岁就跟着村里的叔伯们“挑脚”。从鲁塘挑一百多斤的担子到永兴湘阴渡，来回行程一百八十多里，中途饿了吃几个自带的烤红薯充饥，时常饿得两眼发黑。晚上回到家里还得在松脂灯下看书识字，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跑去请教私塾先生。家里没钱买笔和纸，他就用筷子蘸水，在饭桌上、石板上写字。几年后，他不但能看书读信，还练就了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和毛笔字，为他后来参加革命工作打下了宝贵的基础。

1950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，家父积极投身运动之中。外地来的驻村工作队干部，人生地不熟，工作很难展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家父不怕黑恶势力打击报复，主动勇敢地站出来支持配合工作队的工作。他和村里的几个思想觉悟较高的村民，分头为工作队带路，登门入户做村民的工作，向村民讲解党的土改政策，与工作队一起检查每家每户的山林、田土、水塘、农具、耕牛、房屋等财产。他为当地的土地改革，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。当年11月，仁和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，公开投票选举乡政府干部，他以满票当选为仁和乡民兵中队队长和乡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。他积极工作，严格自律，工作成绩显著。不久，被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。

1952年，郴县人民政府举办全县乡村干部培训班，家父在培训班毕业典礼上向党宣誓，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！

家父从1953年起至退休，一直在基层担任党务工作者和部门负责人。他在鲁塘、坳上两个公社担任过供销社主任、党支部书记，在鲁塘、栖凤渡、南溪、保和、月峰等乡镇担任过党委纪检委员和组织委员。

家父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。他热爱学习。1953年，他任鲁塘公社供销社主任，面对文化水平低不会计算的困难时，便利用休息时间刻苦学习，努力钻研业务。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珠算，学会了“十六两”为一斤的衡量标准下的商品销售定价。后来他成了县里有名的懂业务会管

理的财贸系统优秀干部。

他对坏人坏事敢抓敢管。1976年3月，家父从南溪公社调入保和公社，担任党委纪检委员，驻保和谢家村。8月稻谷成熟时，隔壁的李家村有一个外号叫“扯不烂”的人，经常故意将自家养的10多只大肥鸭，放进谢家村的稻田里偷吃稻谷。谢家村的人看了敢怒不敢言，因为“扯不烂”会些武术，蛮不讲理，很多人被他打伤过。这天中午，“扯不烂”又将10多只鸭放进谢家村稻田，家父知道后，拿了一根很长的竹竿走进稻田里，将正在糟蹋稻谷的10多只大肥鸭赶回了谢家村，关在公屋内，等待处罚。“扯不烂”知道后，手握一根两米长的木棍，气势汹汹地来到谢家村，大声吼道：“姓邓的在哪里？竟敢赶走我的鸭，是不是找死！”家父正在稻田水沟旁边洗手，见“扯不烂”来势凶猛，立刻将围在腰间的一条长汗巾解下，浸湿水后拿在手上，然后大声回答道：“我就是驻村干部老邓！你想干什么！”“扯不烂”二话没说，举棍就朝家父头上劈。家父眼疾手快，将手中的汗巾的一头往空中一甩，就把“扯不烂”的棍子紧紧地缠住了，家父顺势使劲一拉，就把“扯不烂”连人带棍狠狠地摔倒在地，半天动弹不得。“扯不烂”自知不是家父的对手，没了先前的威风，便老老实实答应接受处罚。从此以后，“扯不烂”再也不敢放鸭子进稻田糟蹋谷子了。

他工作非常扎实。1973年，他在鲁塘公社任党委组织委员时，正逢国家修建“坪梅铁路”，他带领鲁塘施工连，参加工程大会战。会战期间，他坚持在工地与民工同

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每天既要严格检查每一处的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，又要严格把控规范施工的操作规程，确保施工安全。最终，鲁塘民工连以安全、保质保量、提前半个月完成施工任务的成绩，被工程指挥部评为先进连，他也因此荣立三等功。

1985年，鲁塘镇党委、政府特邀退休返乡的家父协助工作。家父老骥伏枥，完成了两项重要工作。第一项是全镇人口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的办理。按照第一代居民身份证，存在两大问题，一是派出所户口册上所登记的人口与实际人口相差很大，漏记人口必须挨家挨户上门核实补登，但外出务工人员多，一时半会很难查清；二是现有户口册上登记的人员的年龄、姓名不准确，需要纠正。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，他每天徒步下乡走户，耗时三个多月，终于将问题基本解决，录入电脑的信息的准确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，顺利地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发到居民手中。第二项是按照省委组织部要求，将全镇全体党员的档案重新规范整理。镇党委办现有的党员档案袋中的资料很不完善，归档文件的整理、目录编号等工作没有按规范办理。他沉下心来，按照“一人一袋”的原则，将党员目录、编号、文件序号整理好，装入党员专用袋，党员档案顺利通过了上级党组织的检查、验收。

家父生前被各级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、先进工作者60多次，荣立三等功1次。他的一生是平凡的，平凡之中有光荣，平凡之中有伟大！我们后人对他感到无比自豪！